

进攻性宗教冲突与防御性宗教冲突：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

章 远

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当出现地区性宗教力量破坏现有基本稳定的宗教地图时，如果没有跨宗教间的有效上层权威，那么有两种宗教冲突趋势。具备绝对宗教优势又有军事能力的宗教群体倾向于通过“自助”来确保宗教生存空间权力的最大化，这是进攻性宗教冲突；而防御性的宗教冲突则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为抗争目的。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受到基于地缘产生的威胁程度和冲突各方对威胁认知的影响。本文基于中东冲突的宗教分析，对比中国的周边宗教冲突局势，认为如果宗教地缘“征服”和“拓展”难以避免，保护区域安全需要宗教权力优势方面和弱势方面都维持预防性的和平，同时外界既提供威慑力量又促进各方有效对话机制的建立，还要扶助冲突地经济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进攻性宗教冲突 防御性宗教冲突 地缘政治 中东 周边安全

作者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宗教在政治领域的作用逐渐增强。尽管对于这种现象外界的认知是缓慢的，但是以9·11事件为转折，因愈加广泛的潜在冲突威胁，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本文对进攻性宗教冲突的讨论强调的是那些地区性的宗教群体富有进攻性是因为对现状存在不满又有能力主动诉诸武力，挑起冲突的目的是追求绝对安全，是争夺宗教生存空间上的利益最大化。而防御性宗教冲突最终目的是维持相对安全的各自独立发展状态。这里所展现的对宗教对抗的意图、能力和后果的关注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现实主义到宗教现实主义的探讨和尝试。

相比于传统的宗教比较研究，现实主义论述中的宗教冲突不只是灵性层面上的观念分歧，更关键的是使用包括军事武器在内的暴力手段打击对手的实体对抗。实体宗教冲突对立各方的安全战略多数着眼于争夺含有宗教意义的特定地理优势，可以纳入地缘政治的语境范畴。在地缘意义上，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进行主导或干预，又不存在有效的平衡共识机制，那么不满意现状并且掌握一定暴力能力的地区性优势宗教力量就可能通过主动“自助”来确保其生存空间和宗教权力的最大化。而以获得相对安全的宗教生存空间为目的的宗教冲突本质上是对各种宗教力量可以在同一地区共存理念的尊重。中东地区是诠释宗教冲突的典型地带，本文将基于中东冲突的宗教分析，对比中国的周边宗教冲突局势，理论化地阐释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进攻性宗教冲突和防御性宗教冲突。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地区军事化极端组织跨境活动的国际安全威胁”(20171140039)的阶段性成果。

一、宗教地图的分裂、重叠和再建构

(一) 宗教的全球复兴和持续复兴

当前谈论宗教冲突的时代背景是宗教的全球复兴。一般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苏东剧变和9·11恐怖袭击三个国际性事件共同昭示宗教回归国际政治领域,而更广阔的国际宗教运动的变化从政治伊斯兰、美国宗教右翼和拉美解放神学的政治觉醒就已经开始。^①然而宗教复兴的话题持续数十年之后,繁荣的兴盛局面仍在继续。从美国保守的南部基督教群体到中东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们都在印证着世界范围的宗教发展并没有放缓。具体而言,宗教复兴不仅表现在严格遵循特定仪式和教条的原教旨主义的迅速增长,还表现在公共社会空间和私人空间都不断创新有关信仰的仪式和实践。

鉴于宗教国际复兴以来在公私领域的重要地位,斯科特·托马斯(Scott M. Thomas)直接建议美国应该以宗教提高个人生活水平并以宗教加强国际安全。他认为美国应用宗教信仰来赢得朋友、扩展全球影响力。^②托马斯的建议代表了工具主义的观点,然而工具性地对待宗教,一旦运用不当,反而会导致宗教层面的冲突。即便在美国国内,乔治·H. W. 布什政府后期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也让宗教自由派和宗教保守派同样厌弃。^③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由于全球宗教复兴而被赋予更多权力的那些宗教群体,比如五旬节派和福音派的重视。在美洲,五旬节教派和福音派被认为是未来世界以宗教身份出现的重要政治力量。尽管五旬节教派和福音派新教徒倡导的生活规范迎合了全球时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传播甚广,但他们在拉美一些传统天主教国家积极以政治游说来推进宗教自由的激进态度却引起同宗基督教教派的不安。而他们对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兴趣有悖于人们对宗教出世的想象。应该承认,太过入世和进取的宗教自主推广行为会引发周围的不安全感。

(二) 地缘政治导向的宗教地图

信仰对文化和土地有黏合作用,宗教地图的概念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地缘”意味着在地理上占有一定的领地,“政治”则和国家相连接,地缘政治是关心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之间特殊关系的政治学表述。“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起源于国家对征服的需求。至于国内政府对疆域内部人文地理的政治决策是“地理政治学”^④的范畴。地缘政治发轫于为国家的领土扩张政策服务的学说。地缘政治学最初的代表人物马汉是为美国积极争取海权的军官,主张陆权的麦金德则是持有英国帝国安全立场的议员。地缘政治的分析在空间上的有中心外围、单边、两极、多级等结构模式;在规模上的有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在地理特质上的有重视海洋的海权、重视内陆的陆权等划分。即便是现代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始终带有为主权国家谋地理优势的战略视角。

宗教地图实质上是借助松散的地理地图来维持或者倡导某种信仰,表达抽象的现实。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世界体系在征服世界、拓展自身的同时却也瓦解着其他历史体系。因而贯彻着宗教、语言、饮食习惯、世界观等历史体系连续性的形式都很难再以曾经的样貌继续完整存在,

①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② Scott M. Thomas, "A Globalized God,"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0, Vol. 89 Issue 6, pp. 93-101.

③ [美]安德鲁·普雷斯顿著,罗辉译《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662页。

④ [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但是“文明的主张”^①仍然传承着历史体系独特的政治权利。这正是后殖民文化兴起、地域宗教文化复兴在地缘体系意义上的必然。宗教地图背后不仅有现代性的民族主权国家，还有不断“回到过去”的宗教复兴群体。

宗教地图对地缘结构的要求并不只局限于维持地理上的宗教群体间权力分配，还尝试去满足宗教共同体的想象，更有灵性意义上神圣王国的终极诉求。宗教地图是有边界和无边界的世俗与信仰的杂糅图景，是在地理空间上承袭宗教叙述和约定俗成的生存领域，既投射神圣想象又标识信仰群体差异。比如以麦加为伊斯兰教信徒与广博的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相接触，除了领土边界之外，信仰者还尊崇心灵的想象国土，是不局限于实体性“墨卡托式地图”（Mercatorian map）^②，兼具类文学地图“借喻性”^③的空间概念。

（三）安全困境下的宗教地图变动

无政府国际关系的内在特征导致了国家间武力的运用和军事威胁。安全研究者认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备会产生两类威胁，分别是武器本身带来的破坏性威胁，和掌握武器的体系中其他行为体造成的战败的威胁。破坏性威胁产生防御困境，战败的威胁造成权力与安全之间的困境。军事维度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就是这两组威胁和它们造成的困境之间的关系。^④在对武力的态度上，好斗的群体总是在试图打破现有的地缘格局，并因为冲突行为导致现有地图的分裂、重叠以至再建构。宗教冲突的体系构成与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结构非常类似，同样没有足够的外部干预力量，因为已经不存在绝对霸权地位的宗教力量。另一方面也同样没有有效的上层权威，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甚至同一宗教内部都没有公认的治理权威。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的诟病还来源于国际机制的不完善和低效。如果说主流宗教之间尚能通过宗教对话达成崇尚和平的基本原则共识，然而笼统的原则背后却并没有与此共识相配合的真正国际机制去保证信仰群体对和平原则的遵守、去规范信仰者与武力之间的关系。依照地图而画的地缘战争，是政治版图的争夺，符合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在推崇进攻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以冲突为行为模式才是“标准的地缘政治过程”，是对支配权力和霸权的争夺，结局是零和博弈。巴尔干火药桶、巴以冲突、中东地区外部大国争霸寻找代理人之战等等都是如此。表面看来结束冲突的合作行为不过是“替代的地缘政治过程”^⑤，仍然是便于达到“标准政治过程”的一种手段。那些粉饰为国家防御的领土扩张、文明传播名义下的领土控制都是以“替代地缘政治过程”的合作为名的事实“标准地缘政治过程”罢了。我们面临的未来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模糊混乱模式”^⑥，民族国家的分类框架终将被取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既然以冲突去改变反映权力格局的宗教地图是很难避免的现实政治，那么在强大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宗教群体积极主导，或者被动参与的那些冲突是否关键是为了发展或维持自身安全的生存空间？那些争夺空间的冲突行为的逻辑、未来走向和应对策略是什么？

二、宗教安全生存空间的争夺

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宗教冲突，不论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都与既有的“地缘宗教”概

-
- ①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特著，王逢振译《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③ 梅新林《论文学地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63页。
 ④ 同上，第263页。
 ⑤ [英] 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00-201、208页。
 ⑥ [美] 罗伯特·D. 卡普兰著，骆伟阳译《无政府时代的来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念不尽相同。中国宗教政治研究学者提出的“地缘宗教”^①概念，是指不同于以争夺更大权力和战略优势为要义的地缘政治，把争夺道德意义上的政治制高点、争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宗教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为核心的地缘意义上的宗教战略。并认为世界政治将逐渐从地缘政治过渡到地缘经济，将来也将走向重视地缘宗教的时代。地缘政治层面的宗教冲突是在宗教竞争的环境下，争夺地理优势、地区的控制优势和宗教人口（资本）优势，归根结底是对宗教安全生存空间的争夺。

（一）宗教的安全生存空间

对全球主义的信奉者而言，那些推崇整个世界都是传教对象的宗教派别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宗教。这些教派在“世界性”上比温和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宗教走得更远。比如五旬节派、福音派、萨拉菲主义（Salafism）军事原教旨主义（militantly literalistic form of Islam）教义上都并不拘泥于特定的领土或者特定文化人群及特定社会场域。非主流教派为了扩张信仰而秉持的全球主义为他们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贏取了不逊于主流宗教教派的政治话语权。

俄罗斯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争，在近些年表现为东正教斯拉夫的俄罗斯和穆斯林分裂区域车臣（Chechnya）、达吉斯坦（Dagestan）和印古什共和国（Ingushetia），也即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展现着东正教对伊斯兰极端的恐惧。非洲的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近年同样冲突频发。政教分离原则在许多“南方世界”国家并没有接受的土壤。在那些不发达国家，宗教一直网状地与慈善、恐怖主义、政治集团、反抗组织密切交织重合。例如，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苏菲兄弟会（Sufi brotherhoods）帮助北非伊斯兰抵抗者反抗法国统治的记录。

为争夺宗教安全生存空间的冲突，其特殊之处除了神圣性之外，还因为发生在一国国家内部的、有复杂族群历史原因的宗教群体独立运动、反抗活动，却容易被置入国际大环境之中而被解读为是整体性的世界宗教对立。当代人群已经普遍认识到宗教可以强化群体身份认同。同样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德国天主教群体对政府施压要求承认同为天主教背景的克罗地亚。东正教国家俄罗斯、希腊则明确反对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宗教的安全生存空间是同时满足地理需求、秩序能保护行为体免受威胁和基于信仰的地区共同体结构。

（二）冲突的宗教动员和决策依据

冲突的宗教动员主要有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解释路径。原生主义将宗教视为冲突的根源，工具主义把宗教看做被利用的冲突借口，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是宗教的冲突只能是源于不断彼此建构的观念的对抗。^②无论是哪种解释路径，宗教都因为与冲突相连，使国家机器垄断暴力之外的非法暴力合法化，使现有世俗政治权力相对化，从而瓦解着世俗政治权威系统。

宗教的国内基层社会动员能力，国际层面的跨国社会群体联系功能都给国家治理提出需要专门应对的政治化议题考验。宗教冲突执行者的决策依据首先是这场宗教冲突的本质，也就是基于冲突各方关系的判断，主动挑起方期望使用武力的真实意图。换言之，是侵略还是保卫的冲突本质决定了可以动员的程度。此外，宗教冲突方使用暴力的公开理由，抬己贬人的技巧，决定了周围非本宗教群体社会环境的支持度。宗教冲突决策的另一个关键依据是本信仰群体成员对牺牲和自我牺牲的态度，对与宗教义务挂钩的伤亡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影响着冲突持续的深度。因为无惧牺牲，群体间缺乏信任，没有强效宗教机构斡旋，宗教冲突甚至可能走向升级。

① 徐以骅、邹磊 《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31页。

② Andreas Hasenclev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Does Relig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Impact of Faith on Political Conflict,” 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07 - 137.

（三）基于地缘的宗教冲突过程

首先宗教冲突的动机与情感相关但绝对不只限于宗教情感。情感地缘政治学认为希望、羞辱和恐惧的文化都可能导致地缘冲突。^① 这三种情感几乎每一项都会涉及到宗教团体。宗教文化复兴是希望的情感，以色列的强大对应阿拉伯文化的衰落是导致恐怖主义的羞辱文化，9·11之后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是恐惧心理的反应过度。在情感之外，宗教冲突的动机总是与分裂相关。内战的统计学证明冲突往往发生在宗教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到总人口的10% - 20%。分析者认为这个比例的宗教少数派群体已经足够反抗政府为维持宗教和睦而做出的压力性政策，甚至足够主动站出来反抗现有国家政权，从现有的居住土地上要求独立。^②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影响深远的“文明冲突论”给国际政治分析宗教冲突时一个基本印象，即宗教冲突的对手是那些按照神学、文化与领土结合之后的静态集团化板块。亨廷顿对宗教冲突模块化的分析模式有合理性，但在现实政治面前文明冲突论会遇到宗教团体动态化的挑战。一个庞大宗教集团的领土观念是不断建构和被建构的。比如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Eastern Rite Catholic）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西部存在领土争议。冲突不仅发生在文明之间，更多争议及冲突发生在文明内部。因此宗教冲突研究不仅是模块分析，还要动态团体化分析。宗教团体在某些建制化的教团内部进行宗教活动时有一定的黏合度，但当整个群体作为政治力量与外界竞争对手争夺某些利益时不一定有同等的忠诚度。

其次，宗教冲突的参与者多是脱离了所在国政府控制的那些威胁周边的宗教或者受到威胁的宗教。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可以是国家行为。但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国家不再以宗教为由掀起对外战争。冲突各方不都是国家行为体，比如宗教群体、宗教分裂组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宗教恐怖组织都可以是冲突的参与者。全球化的一个分化作用体现在那些教阶制、等级制的宗教派别的场阈慢慢缩小。垄断性的宗教可能很难在自己曾经的优势地区仍然保持在争取信徒问题上压倒性的影响力。信徒作为自有个体选择度增加了。宗教离散者是另一个不受国家约束却能影响国际关系的信仰群体。以穆斯林“外国战士”^③为代表的国际武装使宗教冲突参与者的构成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在冲突手段和冲突能力方面，目前更快速便捷的互联网，更低廉的航行成本推动着他国人员更容易接受国际极端主义组织或者虚拟乌玛的跨境感召。

其三，从宗教冲突的战略目来看，短期的分离主义和建立宗教王国的终极目的常交替出现。比如印度尼西亚南马六甲（安汶岛、布鲁岛、塞兰岛）面临着分离主义问题。荷兰人为当地人带来了基督教，但今天当地的基督教分离主义运动并不是因为抱怨经济不公这类殖民的经济后遗症。这些基督教信仰者担心的是日渐扩大的穆斯林移民“大迁移运动”^④，分离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信徒统治的国家。印尼因宗教身份引起的分离主义不仅出现在基督教群体，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望加锡也是如此。

其四，就危害程度而言，宗教冲突可以从群体张力一直蔓延升级到战争阶段。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为精细化“民主和评论”而把战争定义为“阵亡人数超过一千”的“武装冲突”^⑤。从规模上看，宗教冲突讨论是那些陷于死亡人士低于一千的暴力对抗。

① [法] 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情感地缘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② Scott M. Thomas, "A Globalized God,"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0, Vol. 89 Issue 6, pp. 93 - 101.

③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 Isla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Winter 2010/11), pp. 53 - 94.

④ [美] 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页。

⑤ [美] 杰克·斯奈德《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8页。

概言之，与退守不同，宗教对抗下的进攻和防御都是积极应对。中国学者在探讨宗教安全的时候注意到相对于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的积极安全，消极安全注重防御性，是被动地消除安全威胁和隐患。^① 在保证生存权力的前提下，满足于相对安全局面的趋势有利于和平问题的解决。矛盾在于宗教群体如果在意宗教输出，难免会陷于宗教扩张的口实，因为对信仰人口、宗教经济资本的争夺最终染指的都不仅停留在消极安全上。就像美国宣称对外输出自由、市民社会、民主、社会凝聚、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价值观，但仍然伴随了持久的对外军事干预。

三、中东地区的进攻性宗教冲突

（一）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图

中东地区连接着欧亚非三个大洲，传统地缘政治同样是争夺优势陆权和海权。比如陆权国家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也与海上霸权国维持友好关系来保证自身的陆权地位稳定。比如叙利亚，因为连接地中海、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历史上就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也是各个文明包括宗教文明的征战前沿。比如伊朗是个山地高原国家，国土面积广阔，几乎没有类似邻国伊拉克的平原盆地，古代强大的波斯帝国就曾经得益于伊朗易守难攻的山地地理特质。当传统战争式微之后，政治博弈走上地区政治的主要竞争场域。美国为了制约伊朗，不仅充分利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存在，也煽动伊朗国内的少数宗教势力，比如支持胡齐斯坦地区的分裂力量，以期复杂化伊朗国内安全局面。石油资源是影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但已经越来越不是决定要素。从石油受益最多的沙特推出“2030”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愿景正是试图摆脱单一石油经济依赖的新政走向。而伊朗虽然拥有石油资源，但因为多年的欧盟和美国制裁，石油并未为伊朗带来匹配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中东既位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断层的前线，又包含叙利亚和伊拉克东西各守一端的伊斯兰教“新月沃地”。2004年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西起黎巴嫩真主党，经过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和人口一半是什叶派的伊拉克，东到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②。随着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扩张，“新月沃地”面临的冲突、分裂、教派斗争愈加彰显。那些宗教少数派并非与国家政治掌权派绝缘。比如叙利亚的逊尼派占人口多数，却由少数派的什叶派掌握军政大权，而什叶派的伊朗通过扶持同为什叶派的巴沙尔政权战略上制衡逊尼派大国沙特。

奥斯曼帝国陨落后中东地区再也没有崛起一个强大的、具有打压性优势的伊斯兰国家，也没有主导性霸权国。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都不断争取更广阔的地缘政治权力。任何侵略、扩张、统一等整合地缘优势的努力都可能招致更为碎片化的结局。

（二）中东的宗教生存空间之争

后殖民国家的殖民遗产包含宗教区块以及宗教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宗主国，映射着分裂国家的历史身份。中东本土没有能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相似的地区霸权强国，并始终被各种外部国家左右着政治局势。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是中东国家主流宗教的亲缘国。中东伊斯兰和西方这两种异质文明以扩张自身文化来保有本文化优势的冲突逻辑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产生的文化土壤。

西方很关注中东的基督教群体的宗教生活。比如美国葛福临（Franklin Graham）的福音派组

^① 徐以骅 《宗教与国家安全》，载《中国宗教》，2017年第4期，第13-15页。

^② 汪波 《海湾地区“什叶派新月带”兴起的宗教政治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1期，第68页。

织“撒玛利亚的钱袋”(Samaritan's Purse)以慈善和发展为主题在苏丹支持着“上帝的子民”^①。这个组织对“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内的基督徒也同样投入极大热情。^②媒体对中东动荡地区的基督教活动也很敏感。比如集中报道摩苏尔(Mosul)东南部克拉克斯(Qaraqosh)基督徒2017年4月9日举行基督受难纪念活动,称之为是2014年“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以来,第一次的公开基督教活动。^③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不仅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家政治能力,还需要同时具备周边国家动荡以及美国的支持。曾经地缘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不可调和的领土覆盖导致的巴以冲突是中东的主要宗教对抗内容。然而近些年犹太教的以色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信仰冲突度相对于中东伊斯兰教宗教内部争斗,前者的重要性活跃度都开始下降。以色列内阁里宗教背景亲近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政治家在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交往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比如担任以色列总理办公厅主任兼通信部长德鲁兹派的阿尤布·卡拉(Ayoob Kara)代表以色列在约旦签署覆盖以色列和约旦、沙特三国的贸易开发计划。更早的拉勒卜·马吉德里(Raleb Majadele)部长甚至要求政府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沙特和伊朗的萨拉菲和什叶派之争是更紧迫的中东宗教生存空间的争夺战。瓦哈比教派、穆斯林兄弟会、保守的穆斯林团体、保守的伊斯兰政党都在积极传播信仰抵制伊斯兰世界世俗化的价值观革新尝试。沙特最有利的宗教资本是麦加和麦地那。沙特利用石油资金在世界各地建设伊斯兰学院、兴建清真寺、印刷宗教文本、派遣教士,还向其他伊斯兰国家穆斯林民众提供丰富的工作机会,以经济支持来争取更多的宗教人口认同。瓦哈比教派思想能够在伊斯兰世界迅速传播和沙特积极推动文化外交政策有密切关系。但瓦哈比派对外宣教所使用的教材中反感苏菲派,反对所有非瓦哈比教派异教者。瓦哈比教派的严苛教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以往中东地区相对的宗教宽容以及宗教共存状态。伊朗在拓展什叶派影响力上同样不遗余力,形式上包含宗教文化输出、宗教外交和政治军事上支持同宗教友。伊朗大力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和叙利亚的什叶派力量,资助在伊拉克境内的国际什叶派民兵团体“伊玛目阿里营”。伊朗积极推进激进的弥赛亚式什叶教义(Shiism),军事上政治上都支持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的教派运动(sectarian movements)。那些中东的什叶派力量获得伊朗的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支持却也消耗着伊朗的国力。尽管如此,伊朗温和派领导人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获得总统连任后,新时期仍然需要面临强硬派的国内教士集团对政府支持国际什叶派运动力度不够的指责。

逊尼派内部也存在着谁是正统萨拉菲的主导权之争,直接的反映是沙特领导下的卡塔尔断交危机。表面原因是黑客攻击下卡塔尔新闻社(NSA)网络主页刊登了所谓埃米尔的一些争议性言论:肯定伊朗是不容忽视的地区伊斯兰力量,肯定哈马斯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等等。断交并没有阻止卡塔尔媒体批评沙特、埃及等国家打压“穆兄会”违背了逊尼派的基本穆斯林道义。

①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 272.

② Samaritan's Purse International Relief, "Franklin Graham Preaches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Iraq on Easter Sunday," April 16, 2017, <https://www.samaritanspurse.org/article/franklin-graham-preaches-the-gospel-of-jesus-christ-in-iraq-on-easter-sunday/>.

③ 比如《纽约时报》2017年4月17日的报道 "Celebrating Easter in an Iraqi Town That Has Lost Its Christian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7/world/middleeast/celebrating-easter-in-an-iraqi-town-that-has-lost-its-christians.html>; 比如路透社4月16日的报道 "Iraqi Christians return to Qaraqosh amid fears for their safety," <https://widerimage.reuters.com/story/iraqi-christians-return-to-qaraqosh-with-fear-and-hope-etc> 等等。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更可能在于宗教争夺，是卡塔尔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想当萨拉菲正统核心的野心^①，导致了沙特的强烈反对。

（三）反恐旗帜下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共同体

中东的政治伊斯兰经历了伊斯兰的复兴派、改良派、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道扬镳，即便是传统保守的主导宗教也可能面临被动的改革力量。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迅猛发展，已经很难准确评估伊斯兰教的具体影响力，因为它已经内化到地区的民主、女权、经济资本等等各种变化表现中。分化中的中东伊斯兰教只有在反共同威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上才有高阶合作的可能。特朗普当选之后第一次中东之行目的之一就是以巨额军售协议推动、鼓励沙特以海合会（GCC）与以色列形成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同盟，打造中东版的“北约”。美国的中东政策从奥巴马时期的注重价值输出转化为以集中反恐为名义的实用主义外交。更具宗教单一性的类“北约”组织是沙特于2015年牵头建立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这个被视为“穆斯林北约”的反恐军事同盟意识到了宗教在反恐中不可避免的作用，因而在军事合作之外邀请宗教学者参与消除极端主义的影响。但是这场伊斯兰世界的跨界反恐努力被认为仅是逊尼派打压什叶派伊朗，最后会沦为教派冲突而受到批判。一个排除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些什叶派色彩浓厚的国家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必须面临该联盟仅仅是以反恐为外壳，事实上以打击什叶派为内核的诟病。至于承载沙特更大野心的“联合国反恐中心”是在沙特强势的资金支持下成立并维持的。但是外界对其反恐效果同样颇有微辞，指控地区大国主持的反恐联盟转化为宗派联盟。沙特自2015年以来组织专门的海合会联军反复空袭打击也门境内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叛军，加深了这种担忧。政治军事同盟却没有摒弃教派分歧，穆斯林共同体只能是空中楼阁。

四、防御性宗教冲突与中国周边宗教安全

金斯伯格总结中国人的世界模式观念是个四个同心圆。^②中国战略地缘关注地始终以周边国家为中心。在历史地理研究者看来中国享有陆地的馈赠，对海洋的依赖远远比不上沿海国家和岛屿国家。几十年来，中国的陆地边界基本稳定，让中国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海军建设，却也带来了中国与太平洋国家在海洋上的地缘争夺。^③目前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集中在东海、南海、台海和朝鲜。中东是中国的重要能源来源国，为避免中东的冲突影响中国的相应利益，中国在寻求不断多元化进口源以分解动荡的压力。而中国周边并不算太平，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亚都有宗教的冲突问题，任何一次周边宗教冲突都可能会因外溢而影响甚至破坏中国的安全局势。与中东地区的进攻性宗教冲突相比，中国周边的宗教冲突多是防御性的。

目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与美国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武装传教士”^④式交往模式。中国的对外形象是非宗教的。尽管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氛围对宗教是总体宽容友好的，但是一般民众并不重视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并不热衷传播意识形态，也并不致力于将本国的政治体系推广到其他地方。中国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使得中国更倾向于和资源丰富的国家

① Middle East Online, "Qatar embraces Wahhabism to Strengthen Regional Influence," *Middle East Online*, Dec 18, 2011,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9555>.

② Norton Ginsburg, "O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in Tang Tsou ed.,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 73-96.

③ [美] 罗伯特·D. 卡普兰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④ 同上，第206页。

(比如苏丹、津巴布韦) 打交道以满足国内生产的庞大需求, 从而促进国内的稳定。却并不像美国一样先用西方设定的价值观去做国家交往的先验判断。周边乃至更远的宗教力量很难挑起与中国的直接宗教冲突。仅有中国公民个人可能因其他因素在他国成为宗教冲突的受害者, 比如2017年韩国传教团队携带的中国追随者在巴基斯坦被绑架被杀的事件。

中国周边国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导致殖民时代, 当欧洲的新教强国们面临陌生的佛教、印度教群体时, 仍然透过新教的视角来理解和引导殖民地的文化、领土观念, 推动了被殖民国的政治精英接受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但在宗教上却埋下了异种文化对抗的麻烦之源。东方文化很难在涉及家庭伦理的议题上, 如同性婚姻、堕胎, 和美国的基督徒一样宽容开放。在民生问题上, 发展中的南方国家普通民众更在意经济正义, 如果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他们更愿意接受比较熟悉和国际认可度更高的国际组织, 而不是外国教会, 哪怕对方是同宗教友。

中国周边国家发生的防御性宗教冲突和逆全球化潮流关系密切。在大规模互相连通之后, 那些后殖民国家有的选择愈加保守, 而不是愈加开放和世俗。基督教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那些国土上的基督徒会毫无保留地拥抱美国。有的则会走向比美国五旬节派和福音派更基要主义的神学信仰, 有的则会与本土文化妥协, 形成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信仰。权力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在这些土壤上出现抬头, 于是信仰群体选择用暴力阻止继续联通的那些冲突具有防御色彩。

防御性宗教冲突反映的是对宗教人口增长造成的国民结构人口再分配的焦虑, 反映了城市化带来的平民暴动的焦虑, 也是对宗教权威的全球结构转型的焦虑, 最终内化到社会变化之中。

五、进攻性宗教冲突与防御性宗教冲突的理论归纳

(一) 理性行为体的破坏行为

地缘意义上的宗教冲突是那些破坏既有宗教格局的变动性宗教力量既争夺实体领土也争夺宗教的发展机会的暴力对抗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学者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悲观地认为国家之间安全竞争的安全困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理论界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判是过于强调以扩张冲突来实现国家利益, 而忽略了国家内部对冲突和战争高昂成本的估算。^① 正如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忽略国内因素的批评, 的确需要考虑到宗教群体内部的分野。集体行为的建构主义解释的重要逻辑是社群中的个体做出行为的判定依据来自于该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周围人对该个体的看法。宗教机制内部教育、管理、宗教对话的手段都能与政府相关政策相联系, 并产生影响。

国际交往中国家行为体交往的前提是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在现实主义看来, 是否选择冲突, 是基于当时利益判断以及国家间互动状况的国家战略选择。^② 虽然存在对宗教团体是否能够得上理性行为体的质疑, 但是现有的研究认为, 宗教信仰团体、宗教背景的分裂团体、宗教极端组织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在参与国际政治现实互动时, 都是基于当下生存安全和宗教利益的判断, 属于理性行为体。即便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群体的反叛和自杀行为也是特定逻辑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是国内恐怖主义的可靠预测指标。然而, 经济和政治开放可能进一步促进动员更多人口的这些受伤害的部分。在解释国内恐怖主义的脆弱性时, 一旦将经济和政治

^① David A. Lake, "Two Cheers for Bargaining Theory: Assessing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the Iraq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 3 (2010/2011), p. 15.

^② 唐世平著, 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164-165页。

开放与少数群体歧视联系起来便会发现：当少数民族剥夺公共财产的规定增加时，恐怖主义是一种理性选择，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有限的政治开放促进反叛动员。^① 政策制定者们也意识到克服社会紧张关系，减少宗教迫害和歧视的关键是促进宗教间宽容的对话。^② 而那些武装组织反复采取自杀式攻击行为如果以殉道来解释，由于殉道行动经常满足某些身份群体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期望，代表性组织可能会采取自杀式攻击，以扩大支持或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加强地位。此外，组织可以进行自杀攻击，表明与同伙的战斗组织的意识形态团结。^③

（二）以善为名以恶为果

信仰丰富了为争取民主、人权、经济发展的政治冲突内涵。挑起冲突需要师出有名，公开宣称的冲突理由往往被装饰为符合善和正义的原则，然而任何冲突都必然以生命、经济、安全、环境的损害为代价，只会以恶为结果。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了准确描绘冲突频仍的世界，诠释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流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国际秩序缺少绝对权威核心。宗教之间也没有绝对权威，即便是在同一个神的体系内部，最高崇拜之下都仅是代理人和信徒，对神圣文本的解读没有真正的唯一性。宗教的复兴和发展既为南方世界提供了更完善的福利，却也孕育了恐怖主义和群体冲突的温床。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现实国际交往中的行为者的行为更抱有悲观主义态度，对他者意图始终抱有最坏假定。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不认可对其他国家始终秉持先验的恶意揣测。^④ 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支持面临明确威胁时，要从国家内部和外部都进行有关军事的制衡来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相比较而言，进攻性宗教冲突对使用对外扩张和文化征服的策略比较宽容，防御性宗教冲突则降低了进攻意愿，更自我克制，以保护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为主。

（三）权力最大化和相对安全

与国家之间的现实主义冲突不同。二战之后，已经没有国家敢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进攻性国家，也罕见国家层面公开地追求纯粹的领土扩张。^⑤ 积极推动以反恐为名向异种文明国家发动战争的小布什政府使得学者担忧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罕见的潜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奥巴马当选被认为是美国回归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信号，从而打消了此类顾虑^⑥，但是宗教冲突却在关键性宗教空间争夺上干预直接宣布领土企图：神的应许之地之争、针对宗教圣地的争端都是如此。进攻性宗教冲突的目标在于扩张，挤占、抢夺他者空间，来实现权利最大化。进攻性宗教冲突往往是优势方挑起的，倾向于以自主拓展势力范围实现生存权力最大化。但是事实上宗教力量用单纯的独占式军事占领并不能解决目前的诸多分裂主义争议。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都获得高度自治的联邦体制似乎好过什叶派占支配地位，类似的由普什图族、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各自自治的松散联邦也被期许作为解决阿富汗部落争端的选择之一。^⑦ 出于防御目的的先发制人冲突，是预防性宗教冲突。宗教力量非优势的一方更积极推动防御性宗教冲突，倾向于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为策略目标。优势方和非优势方彼此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宗教生存空间受到威胁

① Sambuddha Ghatak, "Challenging the State: Effect of Minority Discrimin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Openness on Domestic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42, No. 1, pp. 56 - 80.

② Elizabeth Shakman Hurd, *Beyo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Relig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5 - 89.

③ Benjamin Acosta, "Dying for Survival: Why Militant Organizations Continue to Conduct Suicide Attack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2), 2016, pp. 180 - 196.

④ 唐世平 《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 29 页。

⑤ [美] 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 《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7 页。

⑥ 唐世平 《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 259 页。

⑦ [美]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 61 页。

的程度和对威胁认知的程度。在针对主权国家的进攻和防御策略选择上，外界普遍赞赏选择防御来支持独立和平，因为强调进攻最终只会导致出现大规模杀戮的战争和帝国的到来。^① 但最理想的状态仍然是合作，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冲突。合作的可能性要依赖冲突各方利益之间调解的可能性。利益冲突方始终更新对他者使用暴力意图的解读，接受调和，也就是增加彼此不使用暴力的信任度。稳定需要强者方面和弱势方面都维持预防性的和平。然而没有外部制度规范，地区宗教类无政府状态，群体之间的恐惧感、不安全感、受挫感仍然会引发宗教冲突。

六、结论

世界宗教的信仰、价值观、集体行动同时贯彻着政治性动机。信仰丰富了政治冲突的内涵，而信仰群体的冲突行为也符合现实主义政治解释框架。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宗教群体忧虑的安全生存空间的是神话与现实的混淆。宗教人口变化、城市化和全球结构转型造成今天宗教意义上的地缘“征服”和“扩张”仍然很难避免，但也不是无所作为。参照盖洛普穆斯林研究中心（Gallup Center for Muslim Studies）的数据，往往宗教家庭的孩子比世俗家庭多，宗教因素作为生育率的准确指标远比其他文化身份要更有说服力。宗教已经成为人口增长再分配的驱动要素。城市化为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提供了城市暴动的温床，但是城市化也因为能够为良好意愿的宗教提供发展机遇。温和友善的宗教是应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的预警和防御机制。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可以选择移民曾经的宗主国。但是除了经济类移民，其他形式的移民与当地社会结构难免发生直接碰撞。服装、举止这些外在的符号仅仅是宗教差异的一小部分。欧洲人认为异质宗教移民不愿意融入社会是因为其一，欧洲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能保证涌入的移民获得选举权，或者说难以获得选举权，他们最终会因制度而被社会边缘化。其二，那些移民并不愿意融入周边社会，他们宁可与周围社区隔离以保持群体文化特色。来到欧洲只是需要工作机会，而不抱着建设欧洲社会的目的。^② 传统认为西方与基督教密切相连。另一方面，西方也在丧失基督教领域的主导权。基督教从巴勒斯坦诞生又征服了西方世界，今天它正在逐渐成为“南方国家”的代表宗教。在基督教转为“后西方宗教”^③ 现象面前，推崇宗教促进国际安全的乐观者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内心把伊斯兰世界视为最紧迫的遏制对手，那么政治上，基督教的全球发展和转化恰恰可以给美国提供关键作用。

地缘意义上的宗教冲突能够获得缓解的原因在于：威慑和压制、有效对话、保证安全的宗教生存空间。应对宗教冲突的关键是以促进和激发宗教在增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的积极正面作用为宗教冲突的。外界需要理性面对宗教的政治参与，理解宗教的信仰、价值观、信仰群体的行为模式影响政治目标、动机和具体行动。也要用外力保证宗教力量与军事武装相分割。但当动荡地区分离自治不可避免时，应该区分宗教不是煽动冲突或者独立的唯一缘由，政治统治失败、经济政策失策都更接近政治研究对冲突的最本源的总结。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美] 乔治·H. 奎斯特著，孙建中译《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② [美] 乔治·弗里德曼著，王祖宁译《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

③ Scott M. Thomas, "A Globalized God,"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0, Vol. 89 Issue 6, pp. 93-101.